

历史变革中的沉思

——记改革潮流中的一些人和事

肖岸编



春秋出版社

历史变革中的沉思

——记改革潮流中的一些人和事

肖 岸 编

春 秋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2260/69

历史变革中的沉思
——记改革潮流中的一些人和事

肖 岸 编

春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宝林排版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112千字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1000 册

统一书号：3492·11 定价：0.85元

编 者 的 话

改革的春风，吹拂在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八年了。如今，在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在为改革而思考，为创新而开拓。沿着崭新的时代轨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列车正在日夜兼程。

世界在睁大眼睛看着中国。

我们的人民也在不断总结经验，以坚实的步伐继续前进。

“凡是美好的事物，往往背后都有某种悲剧的成分。那怕是一朵小小的花儿，也要熬过了阵痛才能开放……”在改革的道路上同样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坎坷也是教师，蕴含着深刻的启示。从这里，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认识，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综合思考，把改革的大趋势推向更深的层次，更广阔的领域。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从一些报纸上选编了这本小册子（个别篇章作了删改）。书中记述了一些改革者和心直的人的苦乐沉浮。他们的追求，开拓，成功，他们的挫折苦闷，不幸，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今社会变革的深思，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相信，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会与我们共同得出这样的结论：

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改革的磅礴气势是不可阻挡的！

目 录

看不见的沙漠·····	刘 扬(1)
权力上的“污垢”·····	段心强(10)
历史变革中的沉思·····	马役军(17)
一个厂长的沉浮·····	王艾生(26)
为什么1+1+1小于1?·····	吴苾雯(30)
自强不息者之歌·····	樊永生 陈 石(35)
艰难的起飞·····	张晓崧 刚 建(44)
在新旧对峙中进行探索·····	苗家生(53)
超越“情感障碍”·····	黎戈宁 李 莉(59)
大气候与小气候·····	董 维(65)
毕竟东流去·····	张建伟(70)
纯金的颗粒·····	李 莉(75)
在逆境中改革·····	沈吉庆(82)
守不住的阵地·····	樊永生(85)
受审七个月的厂长·····	张祖璜(92)
他碰到了“几何公理”·····	王体强(95)
厂长和书记之间的一场风波·····	刘国胜(98)
他是“胡汉三”吗? ·····	万国庆(102)
他们为什么敢无视法律尊严? ·····	王建国 石家友(106)
主人的权利·····	李伟中 孙其海(110)
马胜利和造纸厂的职工们·····	孙增印 崔海放(127)
他为事业燃烧·····	刘 娟 张延军 耳 青(134)

一腔正气为改革·····	林 晰 刘国胜(140)
一个厂长受审的启示·····	于培明(145)
他不会被告倒·····	赵彩河 李文海(149)
治厂有方，反被罢官·····	卢汴生 龚立堂(151)
几经波折锐气不减·····	邵 干(153)

看不见的沙漠

刘 扬

因遭厄运而知名度大增的青年改革人物——国营合肥无线电器材公司经理赵云鹏复职4个月了。近况如何？也许因为公司的经营状况再一次明显好转，经济效益再一次稳步提高，也许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看到，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向他露出了笑脸。

对此，他感到高兴。然而，他在改革大潮中的沉浮所引起的思索却还在继续：

一个上任一年就使公司获纯利15.8万元（相当于前9年总和的一倍半），一跃成为全市经济效益最佳单位的青年改革者，在其任职的32个月中，竟受到了长达25个月的审查，直至公司遭到严重经济损失，改革流产，本人被迫辞职；而作为赵云鹏的“审查者”——合肥市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却极少有人对他怀有个人恩怨，其中不乏从来都要求自己“秉公办案”者。那么，为什么他们同那些对赵云鹏怀有私仇的匿名信作者和公报私仇者竟如此一致，大有“不整倒赵云鹏誓不罢休”的气势呢？冥冥之中有些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呢？

共 鸣 的 力 量

赵云鹏原是合肥市商业系统一家无线电修理部的修理

工。1983年春，改革的浪潮把这个并非共产党员、又仅仅是“以工代干”的年轻人推上了无线电器材公司经理的岗位。

在市电子局局长陈炳伦的坚决支持下，赵云鹏一上任，便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民主荐才，任人唯贤。

这一边，赵云鹏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某些无任何专业特长却与各类当权者有着特殊联系的干部、职工，一一从重要的或轻闲的岗位上拉下来，派去当清洁工、搬运工和保管员。他拒绝续发局机关18名超编人员的工资，拒绝报销“上面来的”差旅费和补助费，并拒绝向主管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进贡”。

那一边，电子局机关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则愤慨而严肃地指责赵云鹏“违反党的干部政策，目无党的领导！”并一致呼吁局党委，要“加强器材公司党的领导”。

于是，在陈局长于当年夏天患病而不得不退位之后，电子局党委便立即重视起几封匿名信和一些干部的议论这类“群众呼声”。从此，赵云鹏就被各种调查组牢牢地缠住了。

市电子局保卫科朱副科长，是个对“坏人坏事”颇为敏感的人。她多次率领和参加赵云鹏问题调查组。人到中年的朱副科长有不少家庭困难：上有久病不愈的老母，下有正准备考大学却又身患重病的小女儿，丈夫一天到晚埋头于科研，家务事全由她“一揽子”料理。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她为寻找赵云鹏问题的疑点和证据的努力。她认为，既然组织上要审查赵云鹏，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因此，她“一定要认真真查到底！”

朱副科长这般行事，绝不仅仅因为“权力即真理”这样的思想定式。今年5月下旬某日，朱副科长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赵云鹏这个人，不就是个三级工吗？可在修理部的时候，他就坐小汽车。到器材公司后，来来去去都是小汽车，家里还有电话！”

早在赵云鹏刚刚站到改革的舞台上时，电子局机关的一些老资格的中层干部和有“干部”身份的职员，议论最多的，说来最有气的，也是“三级工坐小汽车”。

这是一种共鸣，观念的共鸣，感情的共鸣。

就连电子局刚刚上任不久的周书记，也在全系统各企业保卫科长和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主任的大会上动员说：“我们系统有个三级工（注：这是赵云鹏探索改革当中获得的别称），家里有高级收录机、电冰箱、彩电，还有空调！这些钱哪来的？对这样的‘暴发户’，我们要查查看！”

其实，至此仍不认识赵云鹏的周书记，被自己的情报来源愚弄了。他对于赵云鹏的这番指责，依据的便是下属和匿名信凭空捏造的“事实”。从小就对“商人”有一种本能的鄙弃的周书记，不能不对赵云鹏改革的真假性质产生怀疑。

于是，他先后派出了均有朱副科长参加的三个调查组，开进器材公司。

曾经当过多年“右派”、“半辈子都在受审查”的周书记，并没有设想过如此“调查”究竟会给赵云鹏以及器材公司的干部、职工，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他习惯了，而且把习惯的当成合理的。

令人欣慰的是，周书记毕竟是懂得一些经济的。从调查组汇报的情况看，他得出了一个朱副科长等人至今还没有得出的结论：赵云鹏确实在搞改革，器材公司的经济效益确实大有提高。此后，他又同赵云鹏接连恳谈了四次，深入了解了这位年轻人探索改革的赤子之心，并顶着巨大的压力，给予了保护和支持。

可是，朱副科长此时已经在用另一种眼光审视这位同自己的观点曾颇为相似的周书记。她发现，周对赵的认识，已

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丧失了党性”，开始与赵“同流合污”。因此，她索性背着周书记和党委其他成员，把一份编造的、推理式的“调查报告”，散发到省市、纪委、工商以及公安部门。这样，“赵云鹏有严重经济问题”的舆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形成了，而不再属于朱副科长的“专利”。

审查压倒一切

1985年初，经团安徽省委推荐，赵云鹏接到了“百名全国优秀厂长(经理)”评选办公室的入选通知书。

第二天，已经接替周书记职务的杨书记亲临器材公司，告知赵云鹏：“公司党委决定再次派调查组进行再调查。”紧接着，由朱副科长率领的第四个调查组出现在器材公司。

6月15日，一个以市电子工业公司为主，市经委同审计局配合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开进了器材公司。

联合调查组刚一登台，就宣布：“不利于调查的话不说，不利于调查的事不做！”而在“调查期间”，“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的那些扣帽子、诱供、讹诈等手段，却都被运用起来。

一时，器材公司一片混乱，经营受到严重干扰，经济效益急剧下降。6月份，原定利润指标是13万元，实际只完成了不到4%；7月份则亏损近8千元。这是赵云鹏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亏损！

8月15日，由市纪委负责人率领的“市委调查组”也进驻了器材公司。

器材公司进入了自1983年3月开始改革以来，最混乱、最困难的一个月。可被干部职工称为“人瘦如柴、心坚如铁”的赵云鹏，并没有推掉作为一个国营企业经理的神圣职责。他带领干部职工，开展了“排除一切干扰，狠抓经济效

益，奋战8月淡季，力争利润10万”的活动。

奇迹出现了——这一月，器材公司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创造了开业12年间的最高月纪录，实现利润14万多元。

调查组很快做出了反应。一边，他们严厉指责赵云鹏这样做，是“抵制、抗拒组织上的调查”，是“目无党的领导”；一边，市纪委调来了工商、税务、审计、银行等部门的人员，对赵云鹏和器材公司展开了更全面的调查。

“市委调查组”进驻器材公司仅4天，就将一份根据“初步调查”形成的数千言的《送阅材料》递到上级部门，那上面列举了赵云鹏的经济、生活等“六大问题”。上级部门又把这份材料修改后作为“情况反映”再上报。于是，几行“重要批示”出现在这份“情况反映”上：“上级派人调查是正常的，动不动就反对，这是什么风气？”

“批示”一来，调查组愈发理直气壮。很快，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奉命前来制裁赵云鹏。

如市工商局先以换发营业执照为由，收去器材公司的营业执照，与此同时又指控赵云鹏“无照经营”，违反《工商法》；继而又把器材公司经营的国产货当作“进口货”，给赵云鹏扣上“走私贩私”罪名，重罚13.36万元。最后，干脆把器材公司总值几乎占用了其全部流动资金的这些“外国货”，全部封存。

此刻，赵云鹏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公司内那几个与主管部门的某些人有着裙带联系的人，不再是由于他坚持奖勤罚懒而得罪过的匿名信的作者们。他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和改革者在观念上相悖、在感情上冷漠的人墙。

十一月一日，他满含悲忿的心情，写下了“辞职报告”。

很快，杨书记主持的市电子工业公司党委，即下文批准赵云鹏辞职。

赵云鹏辞职当天，器材公司许多干部、职工都流下了眼泪。在赵云鹏的身边，他们围成厚厚的一堵人墙，有的请求他“不要走”，有的安慰他“要挺住”。但这些最清楚孰是孰非的国家的“主人”们，无计可施，只能给“公仆”们写下这样一封联名信：

“我们真想不通，电子系统内部那么多企业上不去，长期亏本，到处除帐，有的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他们为什么不去整顿，不去提高，不去调查原因？为什么偏偏抓住一个只有几十人，而利润却超过上千人工厂的器材公司大作文章呢？”

没有人理睬他们。

审查者的思路

当地许多新闻记者们为此忿忿不平，他们携手调查事件的真相。而采访越深入，他们就越感困惑。他们发现，在纪检、保卫、工商等等这些被称为“改革卫士”的部门，极少有人对赵云鹏怀有个人恩怨。可是，他们为什么在对待赵云鹏问题上，又如此一致呢？为什么在改革已成为党的大政方针的今天，上述党政机关的一些同志却对一个积极探索改革的年轻人如此缺乏感情呢？

对此，既整过赵云鹏又支持过他的那位周书记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讲“亲不亲路线分”，现在实际上是“亲不亲观念分”——不要小看观念意识的凝聚力和破坏力！

现在，我们不妨对审查赵云鹏的人的思路作一些初步探讨：

思路之一：集权不可分。简政放权，这本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然而，这些同志念念不忘的却是另一回事。一位领导公开申明“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搞‘厂长负责制’，

它‘削弱了党的领导’。”

联系到赵云鹏，那就更是异口同声：这个“以工代干”的经理，公然把自己公司内（那些有关系无专业能力）的“国家干部”拉下“官位”；公然抵制上级党委（那些违反经济规律，有损改革事业）的指令；公然指责“党派来的调查组”，这还了得吗？更何况执掌这个权柄的还是“三级工”、“非党员”，这哪里还有党的领导？

“抵制”和“指责”的确存在，但这只是一种现象。反映这种行为本质的，主要不是谁“抵制”了谁，而在于什么“抵制”了什么。出以公心抵制不正之风，新的观念抵制陈旧的观念，恰恰是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恰恰是在运用民主的武器保护改革的成果，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有些审查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目中的党的领导，实际上只是“我的领导”，而并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

思路之二：为富不仁。“三级工坐小汽车”，这个形象是再恶劣不过了。听说家里还有高级收录机、电冰箱、彩电，还有空调（很遗憾，不是事实）！“人不得外财不富”，这不是借改革之机谋私利才怪呢！

一查，虽然未能如愿，却也真的发现了“大问题”：一、赵云鹏承包合同所得的奖金高出职工的平均奖；二、器材公司职代会为表彰赵云鹏的出色成绩奖给他一辆摩托车。

显然，他们在衡量是非的时候，用的是“平均主义”一类陈旧的价值尺度。

思路之三：审查总有道理。一份审查报告写道：“鉴于人民来信反映……问题，上级党组织派人认真负责地查清事实，辨明是非，是完全必要的，符合组织原则的。歪曲、干扰、抵制这一调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有关领

导部门和调查组都有人理直气壮地责问记者：“组织上让查一查某个人，难道也是错误的吗？”

审查是消除党内和社会上消极现象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它必须以针对违反政策或违法乱纪行为为前提，而且只能采取合法的、与问题性质相应的方式。

向器材公司派出调查组的根据是什么？

七次派出调查组，从“经济问题”到“生活问题”，进行长达25个月的审查是为了什么？

即使最后都“没有查出大问题”，还是根据赵云鹏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定调为“钻改革的空子”，这又是为什么？

这样的审查能说是支持改革、保卫改革吗？充其量只是为了证明“组织上没有错”。

在对赵云鹏“审查”结束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各调查组从不找赵云鹏本人核实情况。在这种“背靠背”的调查中，有关人员使用了许多违反政策的手段。谁要为赵云鹏说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压制、打击。对于使用这些手段，一些人完全不以为意，这也很值得深思。

思路之四：目中无“人”。调查组一个劲地查赵云鹏，多次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处境尴尬，还是一个劲地查，并不断升级。至于赵云鹏个人的名誉已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以及他的家庭、亲友因此而承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都不干调查组的事。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人”？

切莫小视这些思路、观念的威力。在改革者脚下，都存在着一片广阔的旧观念、旧意识的“沙漠”——几千年形成的看不见的“沙漠”。改革者历尽艰辛踩出的脚印，只要这“沙漠”动一动，就会荡然无存。

还会晴转阴吗

今年6月，在“为改革者提供民主和谐气氛”的舆论声中，中共合肥市委开始听取有关赵云鹏问题及其受“审查”情况的不同意见。

6月12日，市电子工业公司奉命在器材公司召开职工大会，宣布“根据市委的意见”“恢复赵云鹏经理职务”的决定。会上，市委书记杨永良做了书面发言，充分肯定了赵云鹏的改革成绩。以后直至不久前，杨永良同志又多次地表示“对赵云鹏这样的改革者”的关心和支持。

赵云鹏再一次“乘风而起”。

但是，器材公司的干部职工除了在赵云鹏复职那一天，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放了一挂鞭炮外，并没有其他迹象表明，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也许他们是在思考：就在赵云鹏被迫辞职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人称“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这里是否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而在赵云鹏复职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又接连传来改革者被重新“扶上马”的喜讯。如果不轰毁那些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陈旧观念和固有思路，会不会再来一个“晴转阴”呢？

改革，是很艰难的！赵云鹏慨叹不已。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那座由旧观念维系的“古堡”，在当代中国改革者面前，真正发抖了！

他勇敢地面对明天……

（原载1986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权力上的“污垢”

段 心 强

新城子区的汽车修配厂虽小，在沈阳市所引起的议论却大。

议论的中心是它的兴衰：

原来，这个百十号人的小厂象有一种“特异功能”，在不少汽车修配厂关停并转一片萧条中，生机勃勃。国家规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统统完成自不待说，组织试制的汽车胶管卡子还进入国际市场，为国家挣得了外汇。

可是这两年，一个好端端的厂子说下来忽拉一下子就下来啦。已欠29.5万元外债没法偿还不说，每月发工资都犯愁，整个企业处在困境之中。

症结何在？

事实给人们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

领导有病 下级身上开刀

前几年，汽车修配厂经营好，又有“国营”这块金牌，许多人都想往里挤。谁能进去？最后在“权力”上见了高低：上至原区委书记的妹妹，下至公安局科长的妻子，有头有脸的干部亲属几十个，占了半拉工厂。

市场竞争激烈后，汽车修配厂开始不景气。驾驶员出身的代厂长张东辉深知生产中的弊端，也知道该如何治理。但

他毕竟只30多岁，是运动场上的一名新手，不知道“吹哨子的”厉害。他不管各人的背景，精简一半非生产人员，组成精干的、办事效率高的生产指挥机构；针对八级工资制的弊病，把工资和奖金捆在一起，搞计件工资；试制新产品——胶管卡子……一下子把企业搞活了。

改革有时要改掉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往往是靠权力取得的。厂党支部书记侯久让看到张东辉开列的裁减冗员名单，为他捏了把汗：原区委书记的胞妹、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的爱人……这些人被减下去，是要触动全区的神经中枢的。

工资改革后，工业局副局长傅永秀的儿子傅长辉还是我行我素，迟到、早退、旷工，还在工作现场喝酒喝得两眼通红，三句话没说到一块就动手打人。厂里一致要求扣发他当月的工资。张东辉怕副局长找麻烦，稍作让步，只扣发50元钱。

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副局长傅永秀来到工厂，话里有话：“听人反映，你们的奖金发得不大合适呵，怎么多的那么多，少的那么少？”

老实厚道的侯久让，在原则上却棱是棱、角是角：“局长，你要代表个人来，这事不好说；你要代表局领导作指示，咱服从。但也不能只补发你儿子一个人的奖金。”

傅副局长故意避开侯久让的问题，扭头问张东辉：“你的意见呢？”

张东辉直截了当：“该扣。只能这样办！”

傅永秀碰了钉子，拂袖而去。

不久，他儿子傅长辉一把抓住正在检查工作的张东辉，一拳打在脸上，张东辉眼前一黑，昏倒过去。群众把他抬到